

海外华人华侨研究译丛

CHINESE CHICAGO

芝加哥的

华人

1870年以来的种族、
跨国移民和社区

Race,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Community Since 1870

[美] 令狐萍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海外华人华侨研究译丛

CHINESE
CHICAGO

芝加哥的

华人

1870年以来的种族、
跨国移民和社区

Race,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Community Since 1870

[美] 令狐萍 著

何家伟 令狐萍 顾玉芳 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芝加哥的华人: 1870年以来的种族、跨国移民和社区 / 令狐萍著.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5. 5

ISBN 978-7-5100-9656-3

I. ①芝… II. ①令… III. ①华人-移民-研究-美国 IV. ①D771.2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4035号

芝加哥的华人——1870年以来的种族、跨国移民和社区

责任编辑: 程 静 李嘉荟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25号 邮编: 510300)

电 话: 020-84459579 84453622

http: //www.gdst.com.cn E-mail: pub@gdst.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350千

印 张: 20.5

ISBN 978-7-5100-9656-3/C·0044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咨询、投稿: 020-84453622 gdstchj@126.com

致萧成鹏 (Paul C. P. Siu):

其研究与著作给该书以启迪。

致 谢

25年前，我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期间拜读了萧成鹏(Paul C. P. Siu)的《华人洗衣工》(*The Chinese Laundryman*)，被其深深吸引，随即产生了写一本关于全面反映芝加哥华人社会的书的想法。20年前，当我在研究著作《圣路易的华人：从唐人街到文化社区》(*Chinese St. Louis: From Enclave to Cultural Community*, Temple U. Press, 2004)时，我更进一步认识到，对芝加哥华人的全面理解会有助于美国公众对中西部华人社区重要性的认识。为了该研究项目，我频繁往返太平洋两岸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华人社区与侨乡，收集关于跨国移民的资料和相关成果。在长期的研究与写作过程中，许多朋友和机构给我提供了宝贵的支持与帮助。没有他们无私的帮助，这本书不可能得以完成。

中国暨南大学(自2007年以来我即在该校华侨华人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为我到侨乡——广东台山华侨祖籍地——实地考察提供了便利。暨南大学的师生，尤其是华侨华人研究所的同事和研究生，他们的聪明才智与学术热情激励了我。我首先要感谢研究所的高伟浓教授和当时任所长的潮龙起教授，感谢他们在我实地考察时给予的热情支持与帮助，也感谢他们慷慨地与我分享研究资料和成果。我也要感谢高伟浓教授的研究生莫光木给我提供的研究资料。2007年夏天，当我在暨南大学期间，暨南大学副校长纪宗安给予我热情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端芬镇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黄德仪先生，为我去端芬侨乡的旅途担任向导，沿途为我娓娓道来许多源于端芬的华侨家史与地方传说。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王明惠先生，以及台山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关新强先生给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感谢。我深深感谢翁颂平先生及其家庭、梅玉琴及其家庭所提供的帮助。我也感谢当地居民，他们张开双臂，热情欢迎我到他们家进行访问。我感谢广东江门市五邑大学的梅伟强教授，他编辑的最新《梅氏宗亲族谱》对本书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

我还要感谢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侨联、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

广东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福建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他们为我的研究以及学术会议之旅提供了很多帮助。

我非常感谢美国、加拿大的美国亚裔研究领域的同仁和朋友们，他们对我的研究提供了鼓励、支持，对书稿部分或全部给予了评论，并一直坚定地支持我的研究。他们是张玲(Ling Z. Arenson)，肯德·布瓦罗(Kendra Boileau)，陈社红(Shehong Chen)，陈勇(Yong Chen)，罗杰·丹尼尔斯(Roger Daniels)，徐元音(Madeline Y. Hsu)(阅读了部分章节，并提出中肯建议)，劳思源(John Jung)，李胜生(Peter S. Li)，李唯(Wei Li)，凌津奇(Jinqi Ling)，刘海明(Haiming Liu)，马丽萨(Lisa Mar)，亚当斯·麦克考恩(Adam McKeown)(阅读了部分章节并提出建议)，王纯强(Soon Keong Ong)，乔治·安东尼·佩费尔(George Anthony Pepper)，芭芭拉·波萨达斯(Barbara Posadas)(校对了部分章节并提出建议)，舒沅(Yuan Shu)，陈国维(John Kuo Wei Tchen)，王作跃(Zuoyue Wang)，杨凤岗(Fenggang Yang)，杨飞(Phillip Q. Yang)(阅读了手稿并提出宝贵建议)，尹晓煌(Xiaohuang Yin)，余全毅(Henry Yu)，于仁秋(Renqiu Yu)，赵晓剑(Xiaojian Zhao)，郑达(Da Zheng)，周敏(Min Zhou)，和宗力(Li Zong)。

我特别感谢芝加哥华埠博物馆的许多同仁：陈李丽霞(Delilah LeeChan)，陈伊恩·罗斯福(Ian Roosevelt Chin)，招树生(Joe Chiu)，郑慧珍(Grace Chun)，郑万贤(Howard Chun)，伍海伦(Helen Eng)，龚子才(Eugene Kung)，龚谢风雏(Ruth Kung)，罗孟嘉理(Margaret Larson)，李金亮(David K. Lee)，梅阿尔伯特(Albert Moy)，梅素兰(Soo Lon Moy)，托马斯·欧康纳(Thomas O'Connell)，罗圣豪(John S. Rohsenow)，安珠雅·史丹(Andrea Stamm)，黄隆恩(Loong-yan Wong)，朱竹迪(Judy Zhu)以及芝加哥华埠博物馆(Chinese-American Museum of Chicago，简称CAMOC)的所有志愿工作者，感谢他们为了保存美国华人的历史遗产所作出的巨大努力。我也感谢芝加哥公共图书馆华埠分馆(Chicago Public Library Chinatown Branch)馆长陈思(Si Chen)对本人研究的帮助；感谢芝加哥华人咨询服务处(Chinese American Service League，简称华咨处CASL)主任黄苏振恩(Esther Wong)，华人互助会(Chinese Mutual Aid Association)的布朗敦(Steve Brunton)，芝城中美协进会(Chinese American Civic Council)的谢祖谅(Leonard M. Louie)，东南亚中心(Southeast Asian Center)的胡润浩(Run-Hao Hu)，他们为我提供了大量有关各自组织的信息。

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我在芝加哥的朋友梅素兰和罗圣豪。他们现在分别担任芝加哥华埠博物馆董事会主席与秘书，长期为保存芝加哥华侨华人社会的珍贵历史遗产、为创建与发展芝加哥华埠博物馆，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他们阅读了手稿的多数章节，并更正书中人名的英文拼写与中文译名。他们为我的研究提供了许多便利与帮助。

我还要感谢下列朋友，他们慷慨地和我分享他们的生活历史，为本书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访谈记录使得容易流于枯燥乏味的史学著作变得鲜活、生动；予书中的历史人物于血肉，从书中呼之欲出。他们是来自芝加哥的郑慧珍、郑万贤、龚子才(Eugene Kung)、龚谢凤雏(Ruth Kung)、李金亮(David K. Lee)、孙佳慧(Tammy Sun)以及王晓雨(Wong Xiaoyu)；我还要感谢圣路易的候理查德(Richard Ho)、高登(Don Ko)、梁美珍(Annie Leong, 已故)、李仲觉(Chung Kok Li)、王瑞秋(Rachel Wang)。我也从芝加哥华埠博物馆董事会成员对他们的采访中受益非浅。每位受访者名字如下：张梅淑云(Celia Moy Cheung)、陈黄汉贞(Catherine Wong Chin)、陈伊恩·罗斯福(Ian Roosevelt Chin)、赵希文(Herman Chiu)、伍子强(Corwin Eng)、冯苏珊娜(Susanna Fong)、黄怀德(Duc Huang)、李汤清寰(Yolanda Lee)、凌珍妮(Jenny Ling)、童玲(Toung Ling)、劳铎(Tak Lo)、劳育效(Rich Lo)、梅本杰明(Benjamin C. Moy)、达透斯里·斯坦利·泰(Dato'Seri Stanley Thai)、郑汉雄(Charles W. Tun)、郑梅金娉(Lorraine Moy Tun)、伍哈里(Harry Wu)和叶亨利(Henry Yee)。我还要感谢龚谢凤雏与我分享她对郑梅金娉的采访，感谢劳思源(John Jung)教授将我介绍给芝加哥华埠博物馆(CAMOC)，并慷慨分享他的有关美国华人的著作。没有上述朋友的慷慨奉献，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

我还要感谢以下组织与机构成员的贡献：亚裔人士服务机构的唐人街办公室(Asian Human Services Chinatown Office)、潮州同乡会(Chaozhou Tongxiang Hui)、芝城华商会(Chicago's Chinatown Chamber of Commerce)、芝加哥美国华人史学会(Chicago Chinese American Historical Society)、芝加哥历史博物馆(Chicago History Museum)、北芝加哥汉语学校(Chicago North Chinese School)、芝加哥市立图书馆唐人街分馆(Chicago Public Library Chinatown Branch)、美国华人文化中心(Chinese American Cultural Center)、芝加哥华埠博物馆(Chinese-American Museum of Chicago)、芝加哥华人咨询服务处(Chinese American Service

League)、中国基督教联合会(Chinese Christian Union Church)、华人社区中心(Chinese Community Center)、芝加哥中华公所(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汉语学校(Chinese Language School)、华人互助会(Chinese Mutual Aid Association)、协胜堂(Hip Sing Association)、洪门致公堂(Hong Men Zhigong Tang)、世界华侨协会芝加哥分会(International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 Chicago Branch)、李氏宗亲会(Lee Family Association)、龙冈亲义公所(Longgang Qinyi Gongsuo)、唐人街慈善医务所(Mercy Medical in Chinatown)、网柯畔坟场(Mount Auburn Cemetery)、梅氏公所(Moy Family Association)、美国国家档案馆大湖区芝加哥分馆[National Archives Records Administration—Great Lakes Region (Chicago)]、纽贝里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安良工商协会(On Leong Merchants and Laborers Association)、美华协会芝加哥分会(Chicago Chapter of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太平洋环球银行(Pacific Global Bank)、培德中心(Pui Tak Center)、培德基督教学校(Pui Tak Christian School)、玫瑰山公墓(Rosehill Cemetery)、芝加哥大学约瑟夫·雷根斯坦图书馆特藏处(Special Collection of the Joseph Regenstein Library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圣德力天主教中文学校(St. Therese Catholic Chinese School)。

下列华商和美国亚裔商业机构也为该研究项目提供了帮助，在此表示感谢：阿玲餐馆(Anh Linh Restaurant)、亚谐医疗中心(Argyle Medical Center)、C. P.路易旅行社(C. P. Louie Travel)、唐人街烟草店(Chinatown Smoke Shop)、超群餐厅面包店(Chiu Quon Restaurant and Bakery)、黄德录像店(Duc Hung Video Video)、李发杂货店(Fat Lee Grocery)、亨亨珠宝店(Heng Heng Jewelry)、汉记餐馆(Hon Kee Restaurant)、会宾楼(House of Fortune Restaurant)、金星珠宝店(Kim Hing Jewelry)、东方礼品食品店(Oriental Gifts and Food)、太平洋地产公司(Pacific Realty, Inc)、快速清洁自助洗衣店(Speed Kleen Laundromat)、泰国杂货店(Thai Grocery)、三喜餐厅(Three Happiness Restaurant)、亭江餐厅(Tiên Giang Restaurant)、越华东方杂货店(Việt Hoa Oriental Grocery Store)。

我尤其要感谢我所在的单位——杜鲁门州立大学(Truman State University)为我提供教师夏季研究津贴(Summer Research Grants)和研休津贴(Sabbatical Grants)；感谢皮克乐纪念图书馆(Pickler Memorial Library)的罗丽·艾伦(Lori Allen)，她不知疲倦地通过馆际互借给我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感谢杜鲁门大学

出版中心(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ublications)的温斯顿·范德胡夫(Winston Vanderhoof)为本书绘制地图(地图1);感谢历史系(History Department)同事们给予我的大量支持,尤其是研究美国族裔和移民的学者杰森·麦当劳(Jason McDonald),他为书稿斧正,提出独到的建议,并与我分享关于芝加哥族裔研究的文献。我特别感谢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历史系(History Depart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在我完成该书期间,为我提供了研休方便。

感谢斯坦福大学出版社(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的出版工作。两位热情的匿名审稿者给予我的书稿很高的评价,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感谢张少书教授(Gordon H. Chang)对本书的坚定支持和鼓励。感谢编辑斯泰西·瓦格纳(Stacy Wagner)和杰西卡·沃尔什(Jessica A. Walsh),她们加快了书稿的审查进度,并让该书最终顺利出版。感谢克里斯汀·基沃尔(Christine Gever),她出色的文字编辑工作给书稿增色不少。感谢出版部经理卡洛琳·布朗(Carolyn Brown),她的工作团队高效而专业地将手稿变成了漂亮的著作。

最后,感谢我的丈夫萨米(Sami)博士,他是我学术生涯中创作灵感的源泉、坦率的评论家,他也给了我大量的技术支持。没有他长期的辅助、体贴和关爱,本书不可能得以完成。

令狐萍

2012年1月于美国克城

有关翻译和书中术语的几点说明

虽然以普通话为基础的拼音字母被广泛使用于近期学术著作中，但早期的韦氏(Wade-Giles)拼音系统仍然在使用。本书中，只要是中国地名都使用拼音拼写，除了某些固有专有名词，如“Canton”指“广州”。本书中出现了大量华人姓名，而姓名的拼写是本书翻译过程中的一大障碍。尽管在英文的政府记录、档案原稿及新闻报纸中，根据粤语或其他方言的发音所记录的中国人名往往杂乱不统一，但中文资料所提供的华人姓名在本书中是一致的。这种状况使姓名拼写一致几乎不可能做到。针对这种情况，为尽量保持一致，我使用英文资料和中文资料中的原始拼写。尽管如此，拼写的不一致仍然无法避免。比如“梅”在广东话中的发音是“Moy”(一般出现在前面的章节中)，而普通话的拼音是“Mei”(一般出现在后面的章节中)。

此外，单数“社区”(community)和复数“社区”(communities)分别指1912年前后的芝加哥华人定居点。1912年之前，芝加哥华人的华人聚居点基本上是一个单独社区，位于南克拉克街(South Clark Street)附近的卢普区(Lop area)(作者因此用单数“社区”community)。在1912年之后，当大多数唐人街的商号和居民搬迁至舍麦—永活街(Cermak-Wentworth)地区，部分华人仍留在原地。自20世纪60年代起，南华埠(South Chinatown)的逐步扩张、郊区社区的出现、北华埠(North Chinatown)的复兴，使芝加哥出现数个美国华人社区。同时，用复数描绘华人“社区”(communities)，也重点强调芝加哥华人文化、经济、语言、政治和社会的多样性。

序 言

我对海外华人华侨研究产生兴趣，完全出于偶然。那是在1998年暑假，我与妻子前往美国爱达荷州的博伊西(Boise)，看望独自在这座西北山城工作的女儿雪梅。她的职业虽是芯片工程师，但却抓紧利用假日驱车陪伴我们参观邻近许多历史遗址，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年美国人西进之路最为艰险困苦的一段——俄勒冈小径(Oregon Trail)，特别是沿途那些为开发美国西部作出贡献的成千上万华工的历史遗迹。

有一次，我们专程探访爱达荷城(Idaho City)，这里仍然保持着19世纪古色古香的风貌。据说，19世纪60年代初只有12人进入这处深山老林开发，后来很快就发展成为两万余人的繁荣市镇，其中华人占多数，爱尔兰人居其次。此镇西北角小山上建有先驱者坟场(Pioneers Cemetery)，据文献记载有三千多早期移民安葬于此，但现今碑文能够辨认者还不到三百座。当地市民没有忘记华人先驱者披荆斩棘的劳绩，在茂密的苍松翠柏中保留着华人墓地的遗址，但墓中已没有任何尸骨，因为按照中国风俗均经同乡捡拾妥善运回故乡。我们徘徊巡视，不觉时已近薄暮，残阳如血，山风四起，松涛汹涌，游人尽已归去，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仍然伫立在这空空荡荡的墓地之前。

目睹此情此景，忽然想起广东南海一位佚名作者当年撰写的《代同邑故友倡运枢回粤小引》，其中有一段感人甚深的至情文字：“生计无门，痛洒穷途之泪；营谋失路，勉为异域之行。中怀不得已之情，有梦空回故里；外迫无如何之势，频年久滞他邦。闻解缆，则父母牵衣；说扬帆，则妻儿陨涕。嘱子千言保重，怜夫万种叮咛。含悲不使亲知，毅然就道；忍泪不为妻堕，强以扬鞭。险逾恶浪惊波，自慰劳中有逸；危历孤丘熊馆，爰思富或由勤。踏残朔雪严霜，冒尽蛮烟瘴雨。贸易则劳心会计，采金则竭力晨昏。如斯不遂初心，早丧诚然可悯；似此皆由正道，捐生实属堪悲。”^①讽诵之余，内心为之震撼不已；众多死者、尸骨捡运者乃

^① 南海佚名：《代同邑故友倡运枢回粤小引》，收于《旅美三邑总会馆简史，1850—1974》，旧金山，1975年，第250页。

至悼词作者，都失落了自己的名字。问苍茫大地，有谁能为我们讲述这些离乡背井死于异域的中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凭吊归来，幸好购得艾尔松修女(M. Alfreda Elensohn)撰写的《爱达荷华人往事》，这才或多或少弥补了内心的深沉遗憾。回到武汉以后，我又情不自禁地撰写《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评艾尔松的〈爱达荷华人往事〉》一文，经由《历史研究》发表，用意即在于呼唤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海外华人华侨历史研究。作者并非科班出身，其学士、硕士学位以及42年的教学工作均与史学无关，只是在退休以后担任圣基尔德博物馆管理工作，才转而从事爱达荷地方史，特别是这个地区早期移民(主要是华人)的历史研究。艾尔松修女品德高尚，潜心治学，成果丰硕，因此成为爱达荷州科学院、历史学会以及作家协会的资深成员，并曾多次荣获多级奖励。她的代表作《爱达荷华人往事》，除直接征引26种有关爱达荷历史沿革的学术专著以外，还系统查阅了相关8种报纸和3种期刊，其中有5种是爱达荷本地报刊，其他则为邻近的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犹他州的地方报刊。此书时间跨度甚大，从1851年一直写到1930年代，在将近90年的十多种浩繁报刊资料中抉剔爬梳，需要付出多少时间与艰苦劳动！此外，她还长途跋涉，实地考察了许多历史遗址并且访问许多熟悉掌故的老人。此书朴实无华，但行文如行云流水，仿佛老祖母冬夜在火炉边娓娓絮谈有趣的故事，从而很快就把读者引入当时的历史情境。作者力求客观而又详尽地记录下数万早期华工的生活状况，因此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此书在1970年出版后好评如潮，因而在1971年、1979年、1993年连续再版，可见深受当地读者的热爱。

但是此书并非十全十美，也许是我的苛求，其最大缺点是完全没有运用中文历史资料，乃至这些华工的姓名都是残缺不全的英文音译。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无法进行中英文文献对照研究，互相核实补充，因此更难反映早期华工的历史全貌。其次就是作者毕竟并非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因而未能更为深入探讨早期华工当年的历史背景，把华工史放在中国与美国的历史总体中间来考量。当然，筚路蓝缕，其始也简，我们很难对一位高龄半路出家的学者作不切实际的要求。

其实，我对北美华人移民历史所知甚少。比较熟识的老友如王庚武、颜清湟，他们主要还是研究东南亚(即所谓南洋)华人、华侨史，而且都与我一样已经进入衰暮之年。也许是我对北美华人移民史的痴迷感动了上苍，在2012年，即我访寻爱达荷早期华人移民踪迹的14年之后，长期从事美国华人移民社会历史研

究的令狐萍教授，入选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并应聘来我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成为我们学院与研究中心的合作伙伴。从她那里我增长了许多相关认知，并且为这些年北美华裔移民社会历史研究的长足进步而深受鼓舞。最近，她的新著《芝加哥华人：1870年以来的种族、跨国移民与社区》(Chinese Chicago: Race,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Community Since 1870,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12)即将翻译为中文出版，并热情嘱我写，我觉得义不容辞，但又受学力与精力两方面限制，只能略书读后感受，聊以作为卷头缀言。

首先，我认为作者的美国华人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战略眼光。从地区来说，她选定地位重要而又长期被学界忽视的中西部枢纽城市芝加哥。芝加哥是仅次于纽约的大城市，既处于大陆腹地而又影响覆盖全国，这个地区的华人与东西海岸的华人同属跨国移民，而又各具非常明显的自身特点，因此相较于已有较多积累的东西海岸华人历史研究而言，芝加哥华人研究具有较大的开拓空间，更便于经过实证研究而产生新的范式与理念。再从时间来说，芝加哥华人社区始终伴随着整个地区的持续发展而不断繁衍变化，其内容的丰富多彩与复杂变化，自然不是类似爱达荷那样迅速趋于衰落的小城镇所可比拟。因此，芝加哥华人历史既可供宏大叙事，又足够生动再现细节，更能展现理论思维的纵横驰骋。因此，拜读之后视界大开，颇有发现新天地之感。

其次，此书是作者在这个研究领域20多年辛勤耕耘的总结、整合、建构与升华，堪称又一里程碑的经典之作。因为此前她已发表过有关美国华裔妇女史、美国亚裔妇女史、圣路易的华人史、北美亚裔族群及其社区等重要著述，特别是在2010年还与人合著出版了《亚裔美国历史文化百科全书》(两卷本)，她已经具备了驾驭全局、举重若轻的足够条件与功力。所以，这部新著得以从中美双方历史背景出发，从芝加哥唐人街的诞生与发展，洗衣、杂货、餐饮的传统格局，华人社区的家庭结构，一直写到华人社区与中美双方的联结功能，中国留学生和知识群体，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南北华埠与郊区华埠的三足鼎立新态势等等，可谓应有尽有，一览无余。而尤其可贵的是，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提出更为明晰确切的概念与范式，如跨国主义、跨国族群网络、跨国文化社区、跨国婚姻模式等等，这是北美华人移民史已经臻于成熟的标志。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跨国主义所包含的地方、国家与全球三个层次，几乎贯穿于全书始终，其运用之娴熟与涵泳之深沉，都足以显示其学术积蓄之丰厚。

第三，作者充分利用其中西兼通之优长，极大地扩展了运用文献资料的范围，特别是以前的研究者未曾利用过的移民归化局(INS)的芝加哥华人案例(CCCF)、The Ernest Watsen Burgess Papers(E. W. B. Papers)、当地各种报纸、芝加哥华人博物馆的馆藏资料，以及中国的地方志、族谱、侨乡刊物和政府数据等，为深入实证研究提供了足够历史文献资源。此外，还有作者多年亲自深入华人社区调查收集的访问纪录，也在许多方面弥补了文献资料的空缺。由于作者业已定居美国多年，她不仅是华人移民的研究者，而且自己就具有华人移民的类似经历，因此对于其书写历史前辈更具有深切同情与理解，这又是某些中外学者只能从书本上研究华人移民所不及之处。

我经常提倡，历史学者应当充当把过去—现在—未来联结起来的桥梁。历史学者不一定是预言学家，但其优秀的著作必定可以为现实生活提供借鉴，甚至为未来社会趋势提供思索路径。此书最后一章详尽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芝加哥华人社会的发展变化，有的同行学者已经从中发现北美华人移民侨乡的“空心现象”(即因农民工进城而形成的青壮年出走)，可能会对传统移民的源头与数量、素质产生一系列深远影响。我也有类似的联想，因为移民史的研究，特别是当前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汇聚问题的探讨，至少是可以把跨国移民与国内移民进行对照考察。

我的家乡湖州荻港并非侨乡，但因地少人多迫于生计，历来亦多往外移民，不过大半是国内跨省移民。我家自12世祖节文公开始，先是在江苏游幕，继而在河南各地任知县，最终全家定居于山西太原，并死于代州知州任内。13世祖章棣弟兄三人均在山西长大并入仕途，章棣因被左宗棠识拔，随军移驻兰州，其子维藩(我的曾祖父)兄弟两人就在甘肃军营长大，并于西征之役先后迁居酒泉、哈密，随即投军专任长途运送粮饷、军火之责。直至1882年才随左公回到江南，并以军功历任安徽安庆、宣城等地知县、知州等职。我家先辈有两代10余人均安葬于太原东门外剪子湾沙河村。直至维藩公才回荻港落籍归宗，并在杭州郊区购置墓园(章家园)，但自己仍在芜湖、当涂、上海等地举办实业。因此，在1949年以前，家人虽已安居乐业，但始终都有侨皖、侨沪心理，内心总有“外地人”的心结。因此我对“跨国移民”心理特别容易理解。

记得1991年暑假我曾参加一次规模盛大的中国旅美历史(实际也含非历史专业)学者、学生年会，并应邀做有关百余年中国人留学史反思的主题报告。自由

发言中有人提出比较敏感的学成后归留问题。我脱口而出回答说：“中国有两句老话，落叶归根与落地生根，在我看来两者本身并没有正误高下之分，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有根，无论回国或是留在国外，都要扎根于社会并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回报社会，做有益于社会进步与人民福祉的事业。”当时全场报以持久热烈的掌声。此次会议有两位中国使馆教育处官员参加，但会上并未发言。会后他们与我亲切握手，并且笑着说：“这些话只有你们学者能讲。”但是，20年后重新回想我讲的话，觉得道理并未讲透，因为一向被视为金玉良言的“落叶归根”，实际上是农业宗法社会的衍生意识。在全球化席卷全球的今天，“世界大同”“天下一家”才是人类应该追求的共同目标。有识之士除了自己的国籍与故土之外，更应该以负责任的世界公民自居。还是孙中山早先说得好：应以民族主义为基础，世界主义为目标。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平衡，我认为在阅读令狐萍教授的大著时应可得到启发。

随意发挥，未必有当，即以此为序。

章开沅

华师110年校庆于桂子山

内容提要

芝加哥为美国中部重镇，是美国水、路、空交通主要枢纽与中转地，吸引成千上万不同族裔移民从世界各国与美国各地来此工作定居。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亦从芝加哥开始其政治生涯。芝加哥唐人街，俗称“二埠”，吸引无数游人到此参观游览，购买东方工艺品，享受中华美食。然而，一部全面概述芝加哥唐人街的学术专著长期或缺。现在，读者与亚美研究学术界期待已久的，集美国亚裔研究著名专家令狐萍教授十数年研究成果的英文史学专著《芝加哥的华人——1870年以来的种族、跨国移民和社区》(以下简称《芝加哥的华人》)终于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芝加哥的华人》是首部全面概述芝加哥唐人街的学术专著，又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历史传奇，将中国移民胼手胝足、夹缝生存、坚韧顽强、灵活机智的特性淋漓展述。

1870年代，梅氏三兄弟从旧金山抵达芝加哥，在克拉克街经营杂货业，与其他早期华人餐馆、洗衣店形成芝城最早的唐人街。梅氏三兄弟分工合作，建立芝加哥华人跨国商业雏形。长兄梅宗周(Moy Dong Chow)成为唐人街侨领(Mayor of Chinatown)，对内控制侨社，对外斡旋多族裔的主流社会。著名跨国华商汤信，集资成立华美公司，赞助1893年芝加哥主办的世界博览会中国村，奠定其在芝加哥的经济影响。汤信穿梭往来于芝加哥、旧金山、香港、哈瓦那、巴拿马，为早期旅美华人中跨国经商的典范。

早期华人移民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造成华侨社会中跨国婚姻的一些特殊现象：老夫少妻、台山“寡妇”—美国小妾、异族婚恋等婚姻模式，应运而生。侨社中社团林立。20世纪60年代前，安良工商会与中华公所基本保持芝城华埠的主导地位。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华社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多元化，芝城华埠形成三足鼎立的社区形态：建立于1912年位于永活街舍麦路的以华人移民为主的南华埠，1970年代兴起于亚谐街一带的以东南亚华侨为主的北华埠，以及自1960年代以来逐步扩展的位于郊区的中产阶级与专业人才聚居的“文化社区”。促进多元化的芝加哥华社的和谐、稳定与繁荣，成为社区领袖与各类侨团的行动主旨。宗

亲会、安良工商会、中华会馆、中美协进会、华人咨询服务处、华人互助会、芝城华商会、华埠博物馆基金会、华人基督教联合会、圣德力华人天主教会以及数十所华文学校等社区团体组织，各司其能，分工合作，探寻建立和谐多元多族裔芝加哥的成功之道。

《芝加哥的华人》一书将芝加哥华人社区载入史册，扭转美国亚裔研究中东西海岸与夏威夷占主导的传统局面，弘扬美国中西部亚裔社区对美国社会的贡献，有助于提升扩大美国中西部华裔与其他少数族裔在主流社会中的政治影响。